

讲座丛书

第二编

# 文化论衡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十年选萃

◎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编



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讲座丛书

第二编

# 文化论衡

◎ 国家图书馆  
◎ 《中国典籍与文化》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论衡——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十年选萃 /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013 - 4722 - 3

I. ①文… II. ①国…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5284 号

**书名** 文化论衡——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十年选萃

**著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编

---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4722 - 3

**定价** 45.00元

# 序一

安平秋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善本特藏部)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自2001年开讲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个春秋,目前已成功举办了200多场演讲。讲座所产生的影响和其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是主办者始料不及的。这种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办下去。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这个名字,与我们高校古委会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同名。我们的刊物办到今年恰好满二十年,参与组织讲座则已经十年——其实不论是办刊物,还是做讲座,我们一直都秉承这样一种理念:为了不让古书在书架上蒙尘,我们搞专业的人不仅要进行提高性的研究,同时也有必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心得用当代人能接受的语言写出来或讲出来,争取能做一点“文化科普”的工作。

文化论衡

近几年来,由于新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加上网络等现代媒介的推波助澜,“科普”在年轻人当中又重新热了起来。过去谈到“科普”,一般人会联想起“扫盲”、“送书下乡”这些活动;而现在无论是“科普”还是“被科普”的主体都已经转变为有比较高学历的年轻人,从内容层次上看,提高和普及也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科普”已经成为一种很时尚的活动。新知识、新技术需要“科普”;人文学科也需要“科普”,而且我还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文学科更要注重普及,而且越高端的、越冷门的学科,越是要“科普”。

可是现有的文科领域中的一些普及工作,门槛已经够低,时尚也已经够时尚,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时髦的做法和我们想象中的“文化科普”还是不太一样。比如在机场的书店里,大家总可以看到,电视里循环播放着用老、庄、孙子包装过的生意经;在企事

业单位举办的跨界演讲里,儒、释、道也都变为成功人士的文化包装。对这些机场里的教授和职场上人生导师,你不能不佩服他们传经布道一样的演说能力及其所产生的煽情轰动和社会效果;可是这样的普及,好比孩子们爱吃的麦当劳,热量是够高了,可究竟又能有多少营养呢?

而在图书馆里办讲座,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们能和国家图书馆合作,而且合作得很愉快,一合作就是十年,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大家是专业非常接近的同行和朋友,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第一,文化普及活动是公益性的事业,而图书馆也是带公益性质的机构,具体到操持这个系列讲座的古籍馆的同仁们,他们完全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而义务性地为大家服务。第二,图书馆本身是信息的中心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地,从向社会辐射这个角度上说,在图书馆里办讲座,效果可能要比在高校里更好。第三,更重要的是,来图书馆看书,特别是到古籍馆来的读者,一定是醉心于古典学术与古代文化的人。从讲座的组织者,到讲者,再到听者,大家完全是“因书而结缘”,因此我们相信,通过这个系列讲座一定能找到相互的知音。

最精彩的讲演其实很难用文字来记录,甚至说录音和镜头也未必就能捕捉到现场的独有气氛;而现在这份《十年选萃》所收录的讲稿,从比例上说还不及全部讲座的百分之一,我想《十年选萃》的初衷还是以纪念性为主吧。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合作单位向所有主讲的专家学者、向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同仁和出版社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我们才听到精彩的演讲,看到精美的《讲座丛书》。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十年以来一直关注与支持这项活动的听众与读者,没有大家的参与,讲座就不可能办得这么成功。

## 序二

周和平

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创始于2001年,十年来已成功举办230余期,在专家学者与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了一个传播知识、交流思想的平台。受邀登台演讲的嘉宾,既有启功、朱家溍等老一辈文史大家,也有李福清、崔溶澈等海外知名汉学家,更有不少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专家。这一系列讲座以中国传统典籍为中心,引导公众从典籍出发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选题新颖,内容丰富,专业性强,吸引了广大读者,特别是思想活跃的青年学子的积极参与,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文化论衡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并将“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之一。提高全民族素质,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机构的努力不可或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功效。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学校,终身学习的场所,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的文化教育功能,是图书馆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举办各类型学术讲座则是图书馆实现这一职能的有效方式之一。

国家图书馆历来非常重视讲座工作。50年代,在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启迪众多的年轻学子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直到现在,一些在各行各业取得不菲成就的老学者,还常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被他们称为“老北图”的文津街50年代的讲座感念不已。如今,“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文津讲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等均已经成为深受各界群

众欢迎的文化大餐。

讲座是主讲人多年潜心研究的高度凝练,将其内容整理出版,对于社会公众进一步研究与学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国家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最高学府,还要积极总结自身举办讲座的经验,引领和指导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进一步办好讲座。为此,在“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举办十周年之际,我们精选了《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中的上乘佳作结集出版,一方面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与研究参考资料,另一方面旨在总结经验,分析不足,力争将国家图书馆的各类讲座办得更好,同时也为各地公共图书馆开展讲座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这一论述是指导未来一段时期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重要方针,也指明了我国图书馆古籍保护与文化推广工作的发展方向。在此要求的指引下,未来“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还应重点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建设一支优秀的主讲人队伍。选题、内容、主讲人是讲座的三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讲人。主讲人队伍的建设,是一个讲座是否有影响、能否吸引听众的重要因素。我们不仅要邀请文史学界的知名专家,也要邀请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专家;不仅要邀请在京或国内的专家,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抓住机会,邀请海外汉学专家前来讲座。

其次,要吸引更多读者聆听讲座。要注意应用各种媒体,特别是手机平台、互联网,发布讲座预告和介绍。利用新兴媒体扩大宣传,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讲座信息,走进讲堂,学习知识,感受文化,充实心灵。

再次,要加大讲座资源的传播力度。一次讲座往往是主讲人长期研究的结晶,是非常珍贵的文化资源,我们要把它们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让更多不能亲临讲堂的读者能够分享,充分发挥讲座的社会教育功能。在征得主讲人授权的基础上,将讲座内容整理出版,不断扩大讲座的社会效应。要积极利用国家数字图书馆平台,使讲座资源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利用。

今天的图书馆已不仅仅是文献信息资源的收藏和保存机构,同时更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交流环境,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各级各类图书馆都能够继续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大力开展讲座、展览、培训、阅读推广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图书馆建设成为有吸引力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不断丰富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普及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 序三

詹福瑞

善本阅览室平时是个安静的图书室。星期六,这里常有老人和学生进来,静静地坐在红木椅子上听某位学人说古论今。学人不必名气大,有真知灼见、成一家之言即可;说古论今也不必侈谈玄言,针对某部典籍,谈谈其中蕴涵的文化即可。听讲者半为常客,因为这里从没要过一分钱进门费,很满足了听痴们的愿望。红木高座听客常满,散座折椅则可自取,随便得很。讲演者有时还向外赶人,白化文先生讲敦煌目录学,讲前申明,这个课非常枯燥,耐不住的请离席回家,省得课间走人。这样一说,反而没人敢走,耐不住的也都耐住听完了讲。讲演者说得花团锦簇之时,主办者还往往“添花”。戴逸先生讲乾隆,说到十全老人之功,主办者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册文津阁《四库全书》,观书架上一展,朱墨粲然!席下一片惊叹。戴逸先生却自顾自地翻了几页,笑道,搞了一辈子清史,还没有见过真《四库》呢。黄永年先生用江阴味的普通话说版本学:什么是宋版呢?就是宋朝小学生书包里背的书;什么是善本呢?就是这部书在箱子里放上五百年,就成了善本。通俗易懂,听者大乐。讲演席上时有外国人士,李福清讲自费欧游访中国小说,颇有玄奘取经的味道;巴比耶讲欧洲印刷史,让你深切感受什么是“世界文明之母”;甚至从一位年纪很轻的日本敦煌学者荒见太史那里,你都能体会到严谨的治学精神。讲座每月举办,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化的力量不是呼啸的海潮,而是点点渗出的甘泉,入乎神,变乎形,影响人于举手投足之间,主办者的深意在焉。

我曾经听李致忠先生讲过,过去老北图上世纪50年代就开讲座。年轻学子拿到票,风尘仆仆赶赴北海之滨。讲座很影响了一些人,如李先生自己,就是听刘国钧讲书籍史,来了兴趣,退而结网,硕果累累。教书育人,本是学者之职。梁任公言:“战士死

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并没有说学者死于书斋。书斋学人,以著作醒世固然重要,但在快节奏、书籍爆炸的今天,撮其精华以讲之,做一名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同样重要。图书馆高轩广厦,每天读者万计,正是宣讲文化、进行公民教育的好场所。这个讲座起名叫“中国典籍与文化”,非常贴切,用典籍谈文化,是图书馆的正业;研究典籍与文化,教育大众后学,则是高校的正业。老子立言,孔子立行。老子为周守藏吏,相当于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为古籍整理者和教育家,他们理论的结合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也是图书馆和高校催生的婴儿,她走过10年230余讲的历程,如今已是亭亭玉立。国图和高校古委会并未投入巨资,靠着善本部和古委会几位年轻学人勤勉努力,撑起这片文化的天空,令人感佩鼓舞,也预示着我们国家文化光明的未来。

# 目 录

序一 / 安平秋 / 1

序二 / 周和平 / 1

序三 / 詹福瑞 / 1

藏书·读书·治学 / 来新夏 / 1

古籍版本漫谈 / 黄永年 / 9

古籍版本鉴定知识浅谈 / 李致忠 / 19

怎样读《红楼梦》 / 冯其庸 / 35

清代南府与昇平署 / 朱家潘 / 57

不问苍生问鬼神 / 白化文 / 73

论乾隆 / 戴逸 / 89

道家与中国文化 / 楼宇烈 / 103

敦煌的历史与文化 / 宁可 / 123

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 / 廖育群 / 139

科学·历史·文化·社会——中国科技通史的若干问题 /  
杜石然 / 161

永明声律与中印文化交流 / 启功 / 183

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 荣新江 / 191

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 / 金圣华 / 215

附录一 / 242

附录二 / 260

**来新夏**

**藏书·读书·治学**



藏书是关于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问题,也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发轫点。宋朝藏书家晁公武曾论及汉王粲、宋宋绶之能称一代博学者,就因为他们“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此可见藏书之能涵育人才。当然藏书之功尚不仅于此,其更重要之作用乃在于保存、传递一国、一民族之文化,使之世代相传弗替,为立国之基。“藏书”一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文中说有一名徐冯者,曾告人说“智者不藏书”,这当然是指私藏而言。“藏书”既已成为专有名词,则藏书的事实当已较为普遍了。

中国最早的正式藏书是官藏,始于周秦。它与公藏、私藏,并称中国藏书事业的三大系统,而私藏历来备受学者注意。私藏与私学兴起有关,私学的兴盛使图书开始由官藏传入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到处发表政见以取悦国君,因而需用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在各国游说失败后回家,受到冷遇,于是“陈篋数十”,发奋读书,说明苏秦有几十箱私藏。名学家惠施有简书五车,成为“学富五车”成语的原始。自此以后,历朝学者几乎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中国的私藏事业一直贯穿着“仁人爱物”的精神,虽然以藏为主,但不少藏家都愿意其藏书为人所用。如东汉的蔡邕因爱王粲之才而举所藏相赠。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晋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有百余人,他不仅允许借阅,还为读者“置办衣食”。这种慷慨借阅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不少藏书家头脑中,明末有一位藏书家李如一就持一种“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态度。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遗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当然在当代,我们的仁人精神已不仅局限于“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而是有“当与天下人共读之”的气概。清末绍兴人徐树兰

父子建古越藏书楼,出家藏向社会公开借阅,开藏书楼走向现代图书馆的先声。至于对书的“爱物”,从汉以来就有文献可稽。汉代已开始用竹制小箱子(篋)分类置放图书,以免图书受损。魏晋有一个叫曹曾的人修了一个石窟藏书,命名为曹氏书仓。隋炀帝是为后世所非议的皇帝,但他对图书的爱物之心,却极为后世所称道。如《旧唐志》即盛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多种图书储存设备。明代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对防火、防蠹、防潮和防散失都有相应的措施。有的学者为了访求有价值的书,不惜纡尊降贵,亲到书市去搜寻图书,如清初的王士禛就按期在书市出没,把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收藏、保护起来。正由于我国对图书有这样一种仁人爱物的人文精神,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善于保护图书文献的国家。

清朝学者好藏书,但在认识上却有藏书家藏书与读书家藏书之分。如钱曾、黄丕烈以“佞宋”,即专一注重宋版书为藏书的宗旨,视书如古董。孙从添则以藏书为个人癖好,用做鉴赏,这些似非藏书正道。更有以藏书做市易以谋生者,则更无足与论了。我认为只有读书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藏书家,清代中叶江阴有一位藏书家名承应韶者,藏书极丰,“广求佳本,必依次读终卷”,这是为读书而藏书的藏书家。另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张金吾对藏书与读书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这些论述把藏书与读书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所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读书。

## 二

读书是藏书的主要目的,而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也就是为了治学。但并不是所有读书的人都做学问。有的读书只为消遣和享受,一目十行,匆匆而过,凭自己的兴趣,愿看就看,甚至废寝忘食地看;不爱看则或加浏览,或翻不数页就掩卷而眠,这些人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烟云过目,一纵即逝,最多留下点模糊的“书影”而已。另一种人很明白怎样读书,也知道如何读书才能有得;但只进不出,吞噬着别人的成果,以填塞自己的知识空白。这

类既不像牛那样,吃草出奶;也不像春蚕那样,啮食桑叶而吐丝不止,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类人可能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却就是不出奶吐丝,不再创造新的知识,不使旁人受益,还自鸣为“述而不作”。这类人不是怕别人看透自己腹笥深浅的懦夫,便是自私者、守财奴。明明是掠取前人的精神财富,偏偏要深藏不露,自以为独得之秘,不愿有益社会,宁肯烂在肚里,最终与自己共化灰烬。我鄙视这两种人。却敬重另一类读书人,他们不放弃吮吸一切可取的知识,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焚膏继晷地反复咀嚼,像蜜蜂酿蜜一样,创造出有用的知识,贡献自己的成果,济世利人,其中更有一些人,甚至把读书方法和窍要都毫无保留地对后学倾囊相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真正读书人。

谈到读书,必须先知道读什么书?当然要读好书,但也不能采取封闭性的态度,而应比较广泛地读书。不要视离经叛道之作如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成为新道学先生,而应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吮吸精华,排除糟粕。这样的长期积累,读书必能有得。对于反面的图书,只要能善于分辨,又何所畏惧?如果这部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可能得到某些启示。至于对那些低级、鄙俗,甚至淫秽下流的书,还是节约点生命为好,不做无谓的牺牲。读书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不要贪多务得,而要不断回味咀嚼,创造新知识。

凡读书要先读序或前言,这一点常被人忽略,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而必须养成的一种习惯。因为书的序或前言是严肃的作者对全书写作缘起、目的和主要内容的概述,是为让读者对自己的著作有一种轮廓性了解。当你读完作者的序或前言,你就会抓住全书的纲。至于他人所写的序,有的人严肃认真地写序,对全书进行评论,则应一读以帮助对本书的阅读与理解。而某些捧场敷衍的序则大可弃置若粪土,无须为之消耗精力。其次是从头到尾地读一下目录,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篇章结构,一位负责任的作者所写的目录,往往是各篇章的提要。读了这些再去读全书,就比较容易贯通了。

在通读全书时,不要羡慕古人所说的“一目十行”,那是“英雄欺人”的骗人鬼话。读书不要一掠而过,而应该“十日一行”地去读,即精神贯注地认真阅读,养成一种“好学”的学习态度。这是读书的基本出发点。努力多读些书叫“博观”。“博观”是为扩



大知识面的基础。但是,仅仅“好学”与“博观”是不够的。而是要再经过“深思”来“约取”才行。如果不把“博观约取”与“好学深思”紧密结合好,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如果把前二者结合得好,那就为做学问提供了广袤的用武之地了。

### 三

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资料,做有益于社会的学问,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治学”。“治学”不是读几天书就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艰苦的积累过程。在积累过程中,既会有“目轮火暴,肩山石压”的苦状,也会有“时或得之,瞿然则喜”的乐趣。但在走了一段路后,回头检阅所得,往往感到所积累的资料有许多是无用而嗒然若失,甚至认为自己干了蠢事,实际不然,因为当初在读书中所积累的资料绝对认为是有用的,只是由于现在眼光水平有所提高,所以才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因为有了这些“无用”的基础,才能锻炼出挾取“有用”的能力,而且这些“无用”是否真的“无用”,也许是水平所限,未能看出其有用的内涵,也许虽不能当正面材料用,还可用做旁证或背景材料,所以在“治学”的起始,应审慎地对待“无用”。

在“治学”上,务必尽量求读原著。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铜而已。”有位学术前辈曾告诫我说:“‘采铜于山’与‘废铜铸钱’确是亭林不磨之论。但难被放言空论者所接受,甚或被嗤为舍近求远。”他还说:“挑水者,用桶从源源不断的河里挑水,用完再挑,水无穷尽;倒水者,则由别人从河里挑来的水桶中倒水,虽云轻而易举,但倒水时洒一些,势所难免,一如资料一转再转而走样。一旦别人之桶空,则不知别人桶中之水从何而来,只能‘望桶兴叹’,继而环顾四周,是否有挑好水之水桶等人来倒,如一生中只知倒别人桶内的现成水喝,而不论清水浑水,只要是水就行,其后果实不忍设想。”我静聆教诲,不禁叹服前辈功底之厚,见解之深,能以浅近语言阐明深刻至理。

治学的基本点是勤奋坚韧。勤的要求是四勤:勤听、勤读、勤思和勤写,而其根本在勤读,勤读方能博涉,博涉方能使知识源源